

文荟

想起一位老电影人

□ 罗雪村

在这么复杂。’他说我太幼稚，爱感情用事，千万别听了三句好话就答应。”

结果，潘伯伯如愿以偿去了电影学院进修学习，而父亲没听他的劝告，以致后半生命途多舛。

由潘伯伯与我父亲的聊天，我想起老作家姜德明先生，他出口即掌故，他说他的很多故事是与老人们聊天时听来的。

传记作家李辉说过一句话：“最好的教育是聊天。”

回想那些年潘伯伯与我父亲聊天的日子，他们的一生，虽说不上多么精彩，但曾经出生入死于那个烽火硝烟的岁月，又在后来的血雨腥风中被弄得满身伤痕，他们能挺过来，熬过来，多么不易，该会有多少故事可讲。特别是潘伯伯，人生更加丰富，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也留下一笔。

潘伯伯生于1924年，河北任丘人，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他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在鲁艺戏剧音乐系当教员，在晋察冀前线经历战火硝烟。1949年后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学习，后到上影当演员，又调入北影任导演。50年代，他在影片《大地重光》《翠岗红旗》里出演角色，70年代导演红遍大江南北的舞蹈艺术片《红色娘子军》，还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粮食》，是“百部中外经典老电影”之一……特别是他导演的电影《马兰花》，是我这一辈人难忘的美好记忆，好多人至今还会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潘伯伯的爱人，电影《小花》导演张铮，

没想到，十年劫难后的一天，我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就是那个营教导员，恍惚中他刚从银幕上走下来。这时的他，体态发福，特别和蔼。

他一来，家里气氛就活跃。他主要跟我父亲聊天儿，他们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他比我父亲大四岁，一个在抗敌剧社，一个在战线剧社，一块儿演过戏。

接下来的十几年，潘伯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从北太平庄北影宿舍过来，来之前也不打电话，敲门就进，坐下就开聊。他和我父亲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除偶尔留下吃顿饭，一般都是聊一阵拍屁股就走。

我那时候专注画画，没有留意潘伯伯与我父亲都聊了些什么。

后来，他们渐渐都老了，潘伯伯来的次数少了。

后来，潘伯伯回了上海，在那儿去世。

再后来，父亲给我讲过一个他和潘伯伯到中组部谈话的小故事。

1949年进了北京城，不打仗了，可以过安生日子了，想想以后没文化怎么行，父亲就想念书。一天，他到西单中组部谈上学的事，正巧碰见潘文展，他也想进修学习。“中组部的人说现在地方非常需要干部，建议我们先工作一两年再上学，让服从组织，顾全大局。谈完出来，潘文展叮嘱我：‘甭听他们那一套，你想上学就坚持上学，哪儿也不去，他要让你先工作你得慎重考虑，不要轻易答应他们，你在部队好好好的，上他这儿找工作干吗？再说地方上现

上，亦颇沛流离九死一生。是全能的文化巨匠，更是一个张弛有度行为洒脱的真心英雄，一个亲力亲为的美食家，一个精妙绝伦的水木工程建设大师，“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自信，“若问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的淡定，真是“天下舍我其谁”……眉山那个宋朝的院落，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和养分滋养了这么一颗独一无二的灵魂。

车过汉中，两边的视野开阔起来。树更绿而一些房舍也显得错落有致起来，像水墨画。田野里忽然出现一片连着一片的金黄，我看着不由地说了一句是麦子吗？

邻座的一位妇女说不是，那是收割了菜籽后留下的秸秆。

我们便攀谈起来，知道我是去眉山她便笑了，说她老家就在眉山，不过现在已经嫁到成都去了。她说她也姓苏，祖上跟先生苏轼家是本族，苏家最早的宅子就是他们家祖上卖给苏家的。大约怕我不信，又说她一个叔叔现在还在“三苏祠”里工作，虽然已经退了，但是舍不得离开，被返聘了，你要去的话说不定能够遇上他。小时候她经常去“三苏祠”里玩，有时候一玩就是一天，直到天黑了才跟着叔叔回家。女人说着目光幽深起来，可能是想起了往昔的一些美好时光。

过了几个隧道，路边的山坡上出现了熊猫的标识牌，应该是进川了，可能是隧道太小，车速明显慢了，不像高铁倒像是动车了。

女人从沉思中缓过劲来说，你是第一

去眉山

□ 张继

次来估计也只是看个大概。又说可惜，苏宅早年间经历了一次战火，现在好多东西都是依样重建的，倒是有几样东西是苏轼苏洵苏辙当年亲自经历或抚摸过的，你一定要好好看看。她一共说了四样，一个是长在苏家院角的古榕树，那苍老的树干和虬枝上说不定还挂着苏家姐弟攀爬的手印和脚印。一个是一个巨大的荔枝树根瘤，据说也是苏家真实的遗存，东坡先生曾经在这棵荔枝树下一边吃着荔枝，一边读书吟哦。一个是当年苏洵亲自种下的黄荆树，虽然主干已干枯，但是又有新芽发出，且生机勃勃。当年东坡先生的母亲程夫人就是用这黄荆树上折下的枝条含泪教子的。最后一个是苏宅古井，历经千年水量充足，这可是养育了苏门三学士的水井啊，灵着呢。女人说你一定要喝一口水或者用水洗一洗手，说你会更聪慧，更心灵手巧，更文思泉涌……她说得很详细很生动，我跟着她的讲述几乎完整地游历了一次“三苏祠”，苏家父子的形象也便更加清晰飘逸起来。

快到成都的时候女人问我大约在眉山待几天，我说大约四天的样子。她听完了说那你一定要抽一个夜晚最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三苏祠”门口去转一转。我说为什么？她神秘地说你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看到东坡先生呢。我骇然，她说不止一人曾经在午夜前后的“三苏祠”门口见过东坡先生，先生或低头不语，或辗转徘徊，或踽踽独行。我自然是不信的。女人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有人看见过。说完这句话她就下

了车。

但是她的这句话却把我的心弦给重重地拨动了，我一直没能平静下来。换乘去眉山的列车是城际车，座位少，许多人都是站着，带着各种各样的行李和物件。他们用他们的乡音说着一天来的工作和趣事，他们是东坡先生的乡亲或者是邻居，在紧张繁忙的工作间隙，在柴米油盐之余，面对“三苏祠”他们是否也会有我一样的悸动？

接站的朋友到的时候，我还想着“三苏祠”的事，晚饭时，那个女人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大家聊得尽兴，差不多到了十二点才散。我仍想提前去“三苏祠”前感受一下，就叫了一辆车，直奔目的地。

的确很近，只有十来分钟的样子就到了。一条宽阔的古街旁三苏祠庄严耸立，“三苏祠”三个大字让我一下子联想起来宋朝那三个优秀的男人，门旁的楹联在昏黄的灯光下清晰可辨，“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我站在一隅，怀着崇敬的心情，静静地看着。没有月亮，夜幕下整个祠堂显得幽暗而又神秘。街道上少有人来往，只是偶尔有一辆车驶过，置身此地忽然感觉自己如此渺小，我在三苏祠前徘徊着彷徨着行走着，想到车上女人说过的话，那些午夜夜里在“三苏祠”前徘徊，彷徨，踽踽独行的人，其实并不是东坡先生，而是一群如我一样的过客游子，试图来这里求解追思，寄托，寻找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光辉的往事，那些快意人生，那些桥头马上，那些高歌吟唱。我们能找到吗？

□ 姜楠

信给自己在朝里的靠山议论朝政，被人举报丢职，连朝里的靠山都被皇帝疏远了。其实想想，很多当权者，他们一旦失去平台啥都不是。电视剧《潜伏》里的吴站长之所以不惹人讨厌，是因为他从不使用权力给予他的傲慢，而是时时刻刻注意在下属面前表现自己的人情味。曾国藩说：“惟一傲字败人。”曾国藩两次出山回长沙后，他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长沙县衙也亲自造访，自我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违，动多齟齬”，因此“无不复之嫌容，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杨溥晋升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作为皇帝朱祁镇最信任的老友，当朝宰辅，杨溥每次入朝，都是沿着

加冲动了，风险意识变低了。而且至关重要是的，他们更不善于从别人的观点出发观察事物。创伤性脑损伤的说法，或许可以解释权力者的傲慢是一种病态，被权力持续刺激而失去原本对事物客观的观察力。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也说：“权力是一种以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终结的肿瘤。”

大鱼吃小鱼，这世上总有更大的权力。张居正形容严嵩见百官时的：“大鸡昂然来，小鸡踈而待”，下位者不配得到谄媚的笑，但权力者可以，他们得到了足够多谄媚的笑，转头又去对谁露出他的笑？权力的傲慢是一种病，一种被熏染已久，看不清楚自己的病。

北齐毕义云自恃有拥立之功，到处晃摆与皇帝的关系，朝廷赐给鼓吹一部，打发他外任刺史。他跟许多人许诺封官，说外任是暂时的，皇帝迟早让自己回去。更可笑的是，这人出门敲锣打鼓，所有乐器仪仗都都用上了。人未动，前面警蹕开路，弄得满城哗然，如此飞扬浮躁。后来他写

权力的傲慢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长社之战，齐文襄帝高澄对行台郎中赵彦深说：我昨夜做梦打猎，遇见一群猪，都被射中猎取，独有一头大猪没有得到，你说替我猎取，不一会你就给我送过来了。长社之战，西魏将领王思政死战到底，决不投降。高澄派赵彦深进城劝谕，威逼利诱之下，下属们胁迫着王思政带全城投降。王思政想自杀殉国，无奈高澄下令，他若自杀就屠城。为保全下属和百姓性命，王思政含泪投降东魏。高澄笑说：“梦应验了。”他解下王思政的佩刀送给了赵彦深，而完全忽略了王思政的感受，高澄一向如此。他不允许南朝家人给战俘兰京赎身，还不断殴打侮辱兰京，最终导致自己被兰京刺死，死状惨烈，就在他改朝换代，即将成为开国皇帝的前夕。高澄死于权力的傲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达彻尔·凯尔特纳研究中发现,拥有权力的被试者们,行为表现出创伤性脑损伤的迹象——这些人变得更

后窗

野 泉

□ 李木生

孤行惯了，会在乱石与榛莽间独自流连。当然也有绝境，却又不是太怕，觉得人来世上，总得死去，绝境处倒能清楚地知道死路的具体。何况亲历过那么多生命无辜地丢失，也就不存任何幻想地活着，并于寂寥中谛听心脏清醒地跳动。

明确地看清了：沙漠正一望无际。不愿在塑料做成的花草间凑什么热闹，轻轻地摇摇头，系紧鞋带，一个人往前走。

夜间的奇寒与正午的酷热，正一点点耗去还算强韧的精力，只有脚下的沙漠没有尽头。连老子的那头青牛，都风化成一具头骨，被风沙吹奏得呜呜如泣。一只蜥蜴！正摇着尾巴在沙上移走，不时停下来，张望一下，又浮行般滑去。心里正升起莫名的慰藉，蜥蜴又消失得像从没来过一样。

苦笑了一下，抬头瞧一眼火球般的白日，迈步向前，珍珠样宝贵的汗珠，滴去沙中。

盼云彩遮下一烈日，哪怕没有一丝的雨意也无妨。没有云，只有无尽的沙漠。倒有骸骨，被风吹着，惨白如花。长吁一口气，觉出曾有先人在这里走过，便摸摸自己骨棱突出的胸肋，肩背倒在哪里，都会在沙漠里开出一丛白话来。

沙漠的暮色，是另一样苍茫。有些呛人的风暗暗地劲吹，掠过骨棱突出的胸肋，似有弦音铮铮。

是什么影子，让即将坠落的太阳扯得如此细长？惊诧里，循着薄影踉跄地紧跑几步，竟是一株几乎全干的骆驼草。但它的侧枝下，明确无疑地萌生出两瓣深绿的叶芽。心跳如鼓，反复地环视周遭，终于在骆驼草下边的一个凹暗处，发现一块不足巴掌大的湿意。翻滚下去，双手如铲，扒开再扒开，甚至忘记了时间，只是顺着渐渐扩大的湿意，刨深再刨深。终于，有细细的清清的水渗出！心跳如雷……清清凉凉的水，从眼中耳中鼻中，从每一个汗毛孔中潺潺地流进我生命的每个细胞里。双手捧起，淅沥地进入干裂的口中，干涸的心便有绿莹莹的湿意汹涌开来。我抹一把幸福的唇，仰首向天，乖乖，一弯细月就在天上望着我！天上也有沙漠吗？这如钩的弯月，就是天上的小泉了。

我醒在沙漠的纯夜里，我守着沙漠小小的野泉，干枯的生命叮咚着水响。充满沙漠的大地，并不是没有一点希望，甚至不妨让流血的心房润蕴成一眼小小的野泉……

谈藪

都是葫芦叶子

□ 宋祠

重温一则古老的寓言：从前有个秀才，种了一棵葫芦，每天都要去看几次。有一天邻居对他说：“你别光盯着葫芦了，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一治吧！”那个人感到非常奇怪，他说：“我要的是葫芦！”没过几天，叶子上的蚜虫更多了。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一个一个都落了。

是啊，我们都需要的是葫芦。可是没有春天的播种，夏天的施肥和捉虫，哪里会有秋天的收获呢？

小时候的寓言往往只有等到长大以后才能真正读懂。如今我四十岁了，终于到了读懂寓言的年龄。

去参加一个采风活动，有书法家和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其中有一位近几年声名鹊起的年轻艺术家，看他随意点染，自成气象，不禁羡慕道：“你们这行当好。只要成了名，腰里别一个吃饭的家伙（指印章），就能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了。”那朋友一晒，抓起一张写废了的宣纸擦一擦满手的墨迹，自嘲地笑：“怎么说呢？就说糟蹋了多少纸吧。”

是啊，成名固然潇洒，那成名前的苦练，是需要废掉多少张纸呢？

有时候朋友问我：“怎么最近不写东西了？”我只有苦笑，回说：“忙。”其实，残稿锁在抽屉里不知有多少了，不成器，就只有安于小黑屋的命运。当然，有些是改改也能用的，有些就没有那么好运气，只能继续蹲禁闭，甚至从生到死都见不了光，直接踏上废纸篓到收购站的旅程。

就是见光的那些，又有多少是人读者的法眼呢？偶尔入了眼的，又有多少是走心的呢？那走心的文章，当时虽则热泪盈眶了，又能记住多少呢？又有多少能流传后世呢？

一句“床前明月光”，多少思乡泪汪汪？从残唐到两宋，到元明清，又有多少诗人才子是困死在此言之下呢？人类文化长卷漫漫千年，毕竟葫芦是太少了，大部分都是葫芦叶。

说到葫芦，就会陷入一种直奔结果的疯狂追逐当中。其实，文学本身，又何尝不是葫芦叶子呢？在某些人眼里，所有的语言修饰的背后，都需要指向物质的，形而下的，实在的，能抓得住摸得着的东西。

我几年前写过一篇叫做《版面》的文章。当时有朋友抱怨本市那家综合娱乐周刊里，文学版面只有一版，太少了。我说，其实这就是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是只有一版，其他的版面才是这报纸的经济基础。

既然考虑结果没有意义，会令人陷入虚无，那为何不反过来从写作的本身去探求呢？

试想，从浩瀚的亿万年的宇宙，到有了地球有了人类，到有了你我，到有了我们今生的相遇，这该是多大的缘分呢？

生命就是一个从无到有又归于虚无的过程。从老子、庄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那里早就说过了。物质是抓不住，终归于虚无。那么，聪明的，我们这一生怎样度过呢？

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既然是电光石火的一生，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呢？

想起新文学的开端，在20世纪初叶，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在上海举起新文学的大旗，“创造社”从此成立，开创，造就，这真是天才的命名。

拿起笔，创造吧，先不管葫芦了，先照顾好葫芦叶子，看着笔下一个个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语言诞生了，这才是最幸福的事。